

“绿色家园、富丽山村”的深刻内涵

——浙江临安“美丽乡村”农村生态建设实践的社会学研究

郑杭生 张本效

摘要 浙江省临安市以“绿色家园、富丽山村”建设为载体,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推进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是建设“美丽中国”的一种创新实践。临安以绿色新环境、新产业、新社区、新文化“四大绿色工程”为抓手,着力打造“村美、家富、社兴、人和”的美好家园,涉及农业生产、社会关系和自然生态多重层次和方面。这是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之“中国经验”来自基层的一个典型案例,从新的角度展现了“中国经验”的丰富内涵。在实践中逐渐成型的“临安经验”或“临安模式”,反过来能够更好地指导和推进该地的实践,并对全国各地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临安“绿色家园、富丽山村”建设,立足于“富”、“丽”二字,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来理解,其中既包含绿色的富有生机活力的生态家园、和谐家园建设,又指富裕美丽的山区农村建设;既要实现农民的生活富裕、村级集体经济富足,又要实现人居环境优化、村民和谐相处。这兼顾了农村从生产到生活、从基础设施到文化文明、从生态保护到社会管理等方方面面的需求。“临安经验”除了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还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是在实地调查研究基础上,对临安实践经验所做的一种社会学提炼和概括。

关键词 新型城镇化 绿色家园 富丽山村 学术价值

中图分类号 :C9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730(2013)06-0079-06

城镇化的转型发展,为因“空心化”而陷入经济失去活力、环境不断恶化、社会日趋凋敝困局的农村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如何通过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径消解传统城市化发展模式弊端,重塑农村活力,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是一个具有现实紧迫性的重大实践性问题,也是一个具有理论挑战性的重大学术性问题。近年来,在东部发达地区农村涌现了一些有特色的创新实践典型,他们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努力,不仅在经济领域率先实现了

民富村强目标,而且在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环境保护等领域也实现了同步发展,构建和丰富着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之“中国经验”。解读其内蕴的丰富内涵,形成社会学意义上的提炼和概括,进而促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实践健康发展,既是社会学者理论自觉的体现和要求,也是社会学的历史使命。

基于上述思考,我们选取了浙江省临安市“绿色家园、富丽山村”特色品牌建设实践为研究对

象,采用深度访谈等手段对其进行调查研究,并对这一来自基层的、在实践中逐渐成型的、具有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之“中国经验”特点的典型案例——“临安经验”或“临安模式”,进行全面剖析和理论解读。本文是在实地调查研究基础上,对“临安经验”或“临安模式”所做的一种社会学提炼和概括。这种概括提炼,也表明了我们对新型城市化的必要性、新型城镇化的概念内涵、本质属性、发展动力、行动载体等方面所持的看法。

一、临安“绿色家园、富丽山村”创新实践

临安市总面积为 3126.8 平方公里,是浙江省陆地面积最大的县级市。该市地处浙江省西北部天目山区,东邻杭州市余杭区,南连富阳市和桐庐县、淳安县,西接安徽省歙县,北接安吉县及安徽省绩溪县、宁国市。市境地貌属浙西中山丘陵区,呈横长形,东西宽约 100 公里,南北长约 50 公里,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有山地 404 万亩、平原 52 万亩、水面 13 万亩,森林覆盖率达 77.8%,全市辖 5 个街道 13 个镇 298 个行政村,人口 52.6 万人,经济较为发达,连续多年跻身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全国百强行列。

自 2010 年 1 月份开始,中共临安市委、市政府在全市推行“绿色家园、富丽山村”建设工程,希望通过十年的努力,逐步把临安市农村建设成生态环境优美、村风民风和谐、产业模式多样、社会保障健全、乡土文化深厚、农民生活安康的“村美、家富、社兴、人和”美好家园。为了实现这一总体目标,该市采取近期、中期、远期“三步走”战略,围绕着如下四大建设内容有重点、分步骤地全面展开:第一,实施绿色新环境打造工程,走生态之路,实现“村美”;第二,实施绿色新产业提升工程,走富裕之路,实现“家富”;第三,实施绿色新社区建设工程,走和谐之路,实现“社兴”;第四,实施绿色新

文化培育工程,走文明之路,实现“人和”。

从实际运转情况看,临安市“绿色家园、富丽山村”创新实践进展顺利,并从 2012 年开始,在完成“近期”目标后,进入了以点带面、全面覆盖的“中期”建设阶段。2012 年底,全市城乡居民总收入分别达 30903 元和 15764 元;已建成“绿色家园、富丽山村”精品村、特色村、美丽乡村精品村、中心村 71 个,被中共浙江省委省政府授予“浙江省美丽乡村创建先进县”称号。

纵览临安市“绿色家园、富丽山村”建设工程,可以发现,这是一个涉及农业生产、社会关系和自然生态多重层次和方面的综合、系统、宏大的建设工程,它通过不同阶段、不同领域的具体目标设计和极具操作性的推进路径,将美丽乡村建设和城镇化建设连接起来。换句话说,该项工程的最终目标就是以“绿色家园、富丽山村”建设活动为载体,通过对村域社会全方位的建设与推进,一方面在经济领域逐步实现民富村强目标,从而为城镇化的健康推进奠定良好的经济基础;一方面构建基于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协同共进、互生共赢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的绿色新文化,进而为城镇化的健康推进奠定良好的社会环境;一方面在村域社会层面,通过绿色新社区建设,既将留在村中的原子化农民整合在一起,又能够将外出务工农民吸引回农村,形成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合力,从而克服已有和潜在的农村“空心化”困局,为农村城镇化的全面、健康推进奠定人力资源基础。在上述三方面建设基础上,村域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既成为必然结果,也成为进一步发展的条件,进而,一种符合生态文明发展要求的、满足以人为本、包容性发展、和谐发展、统筹协调发展、低能高效发展、环境友好发展的新型城镇化实践模式渐趋成型。

临安市以“绿色家园、富丽山村”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实践,其目标的可达性和具体措施的可

操作性,与其背后的动力机制息息相关。分析构成该机制的所有因素可以发现,至少有四大动力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分别是以政府为推动主体的动力因素、以市场为主体的推动因素和以民间为主体的协同推进因素,以及蕴含于前三大动力因素之中的创新驱动因素。所以也可以说是四大动力。在这四大动力中,“政府推动”呈显性状态,发挥主要与主导作用;“市场拉动”呈隐性状态,发挥辅助与规范作用;“民间协同”有时显性,有时隐性,主要通过参与性发挥作用;“创新驱动”则成为“政府推动”的重要工具和重要内容,并在市场价值的评价与引导下,发挥发展方向引领作用。

首先是“政府推动”。“绿色家园、富丽山村”建设是由临安市政府规划设计并推动实施的,“政府推动”的特点是既为该工程提供和争取足够的政策优势和资金支持,也为该工程的实施提供优良的运行环境,从而有利于动员各相关力量积极从事该项工程。这一驱动力的特色是,它既符合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特点,也充分发挥了政府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其次是“市场拉动”。它的动力特点是满足和适应了该地区市场经济较高发展水平的现实特点。临安市作为浙江省杭州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市场经济已经发育得较为成熟,市场主体参与大型工程建设的能力强大、参与机制较为顺畅、参与的积极性因为丰厚和稳定的利益回报而日趋高涨,再加上政府的倡导和鼓励,市场力量迅速介入,成为“政府推动”工程的重要依靠。第三是“民间协同”。民间协同主要指自治组织和村民参与。他们切身感到“绿色家园、富丽山村”的新型城镇化与其生存和发展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因而激发了参与的积极性。第四是“创新驱动”。“创新驱动”既是政府有意为之的驱动手段,也是市场力量追逐利润的良好凭仗,又是民间改善生活质量与增强竞争力的条件,所以,它作为一支生力军融入了“政府推动”、“市场拉动”和“民间

协同”之中。这里,政府力量的主导性表现在,由于它的积极存在,“绿色家园、富丽山村”工程的四大动力被很好地整合在一起,共同推动该项事业的顺利开展。它从一个特定角度诠释了政府力量、市场力量、民间力量和创新力量的融合性,并诠释着四大动力整合后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倍加的推动力量。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临安市“绿色家园、富丽山村”建设工程已经包含着独特内容、实现路径、动力机制等密切关联的几大结构性要素,再加上“绿色家园、富丽山村”表述所体现的对“富”与“丽”核心价值的喜好和追求,已经形成了一个体系化结构,不断推进与优化着该地农村的城镇化实践。因此,我们认为,这是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之“中国经验”来自基层的一个典型案例,它从新的角度展现了“中国经验”的丰富内涵。并且,这一在实践中逐渐成型的“临安经验”或“临安模式”,反过来能够更好地指导和推进临安城镇化实践的健康发展。与此同时,它内蕴的整合各类动力因素、因地制宜推进农村城镇化发展的思路 and 做法,对全国各地城镇化实践,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二、临安“绿色家园、富丽山村”创新实践的社会学思考

作为“中国经验”来自基层的一个典型案例,临安市“绿色家园、富丽山村”创新实践具有独特的社会学意义。基于我们所提倡的研究“中国经验”的“二维视野”和“双侧分析”方法,可以对“临安经验”或“临安模式”作如下的解读。

首先,“临安经验”或“临安模式”是在特定时空背景下的创新性实践探索。这个特定时空,既指现代性全球化长波进程所构建的世界范围的广域时空,也指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所提供的本土时空。

这两个特定时空提出和要求的时代任务和发展主题,规定了“临安经验”或“临安模式”的创新方向和基本内容。在里,本土化与全球化得到了有机的链接,“临安经验”或“临安模式”既受到二者的约束和规范,也因二者而受益,获得了双重发展机遇和发展支持,这些双重受益,既包括市场因素也包括政策因素,还包括技术因素,甚至在人力资源等具体发展要素等方面,也实现了双重受益。

其次,“临安经验”或“临安模式”是立足自身区位优势、资源禀赋特点、社会经济发展基础因地制宜的创新性实践探索。临安市区位优势明显,浙江省快速发展的经济和杭州市快速推进的城镇化,是作为杭州市郊市的临安创新自身城镇化模式的基础和前提,高达 77.8% 的森林覆盖率和丰富的山林资源,是其追求“富”与“丽”最重要的资源优势;较高水平的经济实力和因之形成的全市域覆盖的优良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成为其创新性实践探索的强大支撑。上述几大要素的存在,是“临安经验”或“临安模式”得以形成的充分和必要条件,它一方面从新的角度展现了“中国经验”因地制宜的本土特色和丰富内涵,另一方面也说明,在社会学“中国经验”研究过程中,既要关注现代性之全球化发展趋势,也要投身于本土社会转型变迁的经验研究。^[4]

第三,“临安经验”或“临安模式”是“富”与“丽”和谐统一的创新性实践探索。“绿色家园、富丽山村”建设工程的立足点和核心价值是“富”与“丽”,它既是对过去强调数量的外延扩张模式建设性批判反思的成果,也是向重品质的内涵式发展转变与推进的抓手与载体。与之相对应,其城镇化的推进路径就不仅仅是“见物不见人”的传统城镇化模式,而是体现为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追求。因而,其以绿色新环境、新产业、新社区、新文化“四大绿色工程”为抓手,着力打造“村美、家富、社兴、人和”美好家园的整体设计和推进路径,才

有了自己的灵魂和主线。

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来理解,“绿色家园、富丽山村”既包含绿色的富有生机活力的生态家园、和谐家园,又包含富裕美丽的山区农村,是“富”与“丽”的和谐统一体。或者说“绿色家园、富丽山村”要建成的新农村,是融“富”于“丽”、融“丽”于“富”的有机统一体,是将城镇化与新农村“融会贯通”的新格局。同时,“绿色家园、富丽山村”既要实现农民的生活富裕、村级集体经济富足,又要实现人居环境优化、村民和谐相处。这兼顾了农村从生产到生活、从基础设施到文化文明、从生态保护到社会管理等方方面面的需求,它不仅尝试将农村社区经济发展的“富裕”诉求和环境保护的“美丽”诉求整合在一起,构建二者互生共赢、协同共进的双赢格局,而且,还将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发展的最终受益者落实到村民身上,突出了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内容——人的城镇化主题。

第四,“临安经验”或“临安模式”是自我纠偏与自我超越的创新性实践探索。作为新型城镇化的地方性探索努力,“临安经验”或“临安模式”无论是在政策设计层面,还是在具体实践层面,都还存在不成熟、不完善之处。以该市政府和辖下职能部门为中心的领导与管理主体,能及时与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适时提出优化方案,为整个建设工程的良性运行提供保障。例如,在第一阶段行将结束、第二阶段渐次铺开之际,他们发现并总结出实际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五个主要问题,即重“丽”轻“富”、重“表”轻“里”、重“量”轻“质”、重“给”轻“谋”和重“建”轻“管”等现象,给出对策,规范与纠偏工程建设实践活动。这种自我反思、自觉纠偏并在纠偏中不断超越自我的努力,反映了“政府推动”模式的主动性和便捷性,也反映了“市场拉动”的灵动性和效率追求,是“临安经验”或“临安模式”对全国各地有参考意义的又一重要所在。

三、临安“绿色家园、富丽山村”创新实践的学术意义

“绿色家园、富丽山村”建设工程,是临安市政府设计并推动的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一种创新实践,是新型城镇化的新载体,它以绿色新环境、绿色新产业、绿色新社区、绿色新文化“四大绿色工程”为抓手,着力打造“村美、家富、社兴、人和”的美好家园。作为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之“中国经验”来自基层的一个典型案例,“临安经验”或“临安模式”从新的角度展现了“中国经验”的丰富内涵。这使“临安经验”或“临安模式”又具有了超越临安本身的意义,不仅具有指导本地、为外地提供实践的参考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就其学术意义来说,至少有这样几点:

第一,“临安经验”不仅表明了新型城镇化的必要性,而且本身就提供了一个新型城镇化的活生生的案例。有关我国城镇化现在所处发展阶段的问题,学术界以致政界立足于转型社会的总体性特征,从不同方面提出、揭示和证明我国城镇化进入新型城镇化阶段的特点。仇保兴认为我国城市化发展模式面临转型,新型城镇化给我国的城市发展带来机遇和挑战^[2];郑杭生基于实地研究的思考,以新型现代性的理路理解和阐释河南省郑州市“三化两型”城市化发展与建设实践,提出了城市社会的大时代转折观点^[3];李培林在将城市化与我国新成长阶段合并思考的过程中,提出坚持走新型城市化道路观点。^[4]总之,对我国城镇化已经由传统型向新型城镇化转型这样的阶段性特点,相关研究者的视角虽然存在差异,但认识是一致的,新型城镇化成为我们研究“中国经验”、分析中国问题的基本依据。“临安经验”为这一点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践依据。

第二,“临安经验”为传统城镇化与新型城镇化的差别提供了某种参考系。现在,以人为本、内涵发展、包容性发展、和谐发展、统筹协调发展、低能高效发展、环境友好等内容,成为公认的新型城镇化关键要素,也成为新旧城镇化发展模式的分水岭。“临安经验”具体地表明了新型城镇化之于传统城镇化或旧式城镇化的比较优势在哪里。笔者几次到上田等村庄,看到那里的村民们在绿色环境下安居乐业的生活情景,不能不感叹,这真是名副其实的“美丽乡村”!这种景象与那些承受旧式城镇化消极后果的村庄没有生气的景象,形成鲜明的对比!如果说,“临安经验”使人看到的是“村美、家富、社兴、人和”,那么,在那些承受旧式城镇化消极后果的村庄则往往是“村丑、家贫、社衰、人躁”!

第三,“临安经验”为新型城镇化动力问题的探讨提供了借鉴。由于新型城镇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再加上我国各地生产力发展水平差异巨大,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等各种发展要素分布也极不平衡,在有关新型城镇化的动力机制、发展载体、推进手段等方面,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认识。关于新型城镇化的动力问题,目前学术界研究观点主要集中于三大方面。其一认为,信息化、农业产业化和新型工业化是新型城镇化的动力,并决定了后者以人为本、创新驱动和可持续发展的特征^[5];第二种观点认为,新型城镇化应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新型城镇化的“新”就是要由过去片面追求城市规模扩大、空间扩张,改变为以提升城市的文化、公共服务等内涵为中心(天津经济,2013);第三种观点认为,新型城镇化要从“要素驱动”走向“创新驱动”,形成“政府推动”和“市场拉动”双重动力机制(辜胜阻,2013)。关于新型城镇化发展动力的上述三种观点,虽然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交叉与重复,但是,各自强调的重点是不相同的。“临安经验”的四大动力,应该说是展示了动力

问题上探讨的全面性 ,更展示了政府、市场和民间三大主体的一种新型合作关系。这是更有社会学特质和意味的。

第四,“临安经验”为新型城镇化载体和推进手段的探讨提供了启发。在动力机制问题上的认识差异,也导致在新型城镇化载体和推进手段方面出现了不同的理解。第一种观点更加重视城乡一体化发展 ,因此,城乡互补协调发展、低能耗、高质量、低环境冲击、集约式机动化和社会和谐型城镇化,就成为其主张的新型城镇化载体和推进手段^[6];第二种观点则强调推动城市现代化、城市群化、城市生态化和农村城镇化(天津经济,2013),其着力点和重心是城镇品质的提升;第三种观点强调从重数量的外延式扩张向重品质的内涵式发展转变,重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也强调政府在城镇建设体制、户籍制度、农村土地制度等方面的体制创新(辜胜阻 2013);第四种观点着眼于我国宏观发展趋势,认为新型城镇化是新型城市与亮丽乡村并行建设的过程。随着我国向本世纪中期达到中级城市型社会这一目标的趋近,“美丽城乡”行动计划将不断获得新的动力,必将促进一二三产业相互融合的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形成全域覆盖的城乡一体化和城乡协调发展的新格局^[7]。与动力问题相联系的新型城镇化载体与推进手段的上述研究成果,对在实践领域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模式提供了有力的

知识支撑。实际上,象“临安经验”这样的实践领域的探索也在不断丰富着新型城镇化的“中国经验”。将实践领域的探索和理论领域的思考结合起来,用理论提炼和概括实践经验,用实践经验丰富和推进理论探索,对于理论本身的发展,对于中国特色城镇化实践的健康推进裨益良多。本研究对“临安经验”或“临安模式”热切关注的目的亦在于此。

注释 :

- [1][3] 郑杭生:《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深化》(上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年。
- [2][6] 仇保兴:《新型城镇化:从概念到行动》,《行政管理改革》,2012 年第 11 期。
- [4] 李培林:《城市化与我国新成长阶段》,《江苏社会科学》,2012 年第 5 期。
- [5] 倪鹏飞:《新型城镇化的基本模式、具体路径与推进对策》,《江海学刊》,2013 年第 1 期。
- [7] 杨敏:《中国城市化之抉择——初级发展还是科学发展》,《探索与争鸣》,2012 年第 11 期。

作者简介 :郑杭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心主任,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张本效,浙江农林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临安 311300。

(责任编辑:羽林)